

中埃当代女性文学中的文化身份二元性

以严歌苓与梅·蒂尔米萨尼作品为例

ازدواجية الهوية الثقافية في الأدب النسائي الصيني والمصري المعاصر

أعمال يان قه لينغ و مي التلمساني نموذجاً

إعداد

د. يسرا كامل حسين

مدرس - قس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كلية الآداب - جامعة حلوان

yosrakamel@gmail.com

The Duality of Cultural Ident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Egyptian Women's Literature

The works of Yan Ge Ling and Mei Al-Telmisani as example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dual cultural ident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raised by Chinese and Egyptian novels in recent years, thus this research entitled: "The Duality of Cultural Ident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Egyptian Women's Literature-through the works of Yan Ge Ling and Mei Al-Telmisani as example" seeks to study the crisis of dual identity represented by the dual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in the works of Yan Ge Ling and Mai Al-Telmisani. Identity represent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elf (the ego) to the other, in this relationship; each party tries to highlight its difference compared to the other party.

We will approach th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highligh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how Yan

Ge Ling and Mai Al-Telmisani addressed the issue of dual cultural identity among women in their literary works. The research will also present the way out of the crisis of dual identity that both writers proposed through their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Duality of Cultural Identity; Women Literature; Yan Ge Ling; Mai Al-Telmisani

المخلص:

تعد مشكلة ازدواجية الهوية الثقافية من أهم المواضيع التي أثارها الروايات الصينية والمصرية في الآونة الأخيرة لذا يسعى هذا البحث بعنوان: "إزدواجية الهوية الثقافية في الأدب النسائي الصيني والمصرى المعاصر- أعمال يان قه لينغ و مي التلمساني نموذجاً" إلى دراسة أزمة ازدواجية الهوية المتمثلة في ازدواجية العلاقة بين الذات والآخر في أعمال يان جه لينغ وأعمال مي التلمساني، فالهوية تمثل علاقة الذات (الأنا) بالآخر، وفي هذه العلاقة يحاول كل طرف إبراز اختلافه مقارنة بالطرف الآخر.

وسأتناول البحث من منظور الأدب المقارن لأبرز التشابه والاختلاف بين كيفية تناول كل من يان قه لينغ و مي التلمساني لموضوع ازدواجية الهوية الثقافية عند المرأة في أعمالهم الأدبية وسيعرض البحث أيضاً السبيل للخروج من أزمة ازدواجية الهوية الذي إقترحته كلتا الكاتبتين من خلال أعمالهم الأدبية.

الكلمات المفتاحية:

إزدواجية الهوية الثقافية - الأدب النسائي - يان قه لينغ - مي التلمساني.

当代中埃女性文学中的文化身份二元性 以严歌苓与梅·蒂尔米萨尼作品为例

摘要:

本研究题为“当代中埃女性文学中的文化身份二元性——以严歌苓和梅·蒂尔米萨尼作品为例”，这个研究以严歌苓和梅·蒂尔米萨尼作品中的身份来讨论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双重身份危机，所以本人通过与不同的“他者”的关系来认识自己的身份。在这种关系中每位作家都试图突出自己与“他者”的差异。

本人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讨论严歌苓和梅·蒂尔米萨尼两位作家在她们文学创作中怎么呈现双重身份问题的异同点，本论也将提出两位作家通过文学作品提出的摆脱双重身文化份危机的出路。

本论又通过两位作家的创作来提出双面文化问题的解决，就是在这个双面文化冲突下趋利避害，也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点，最后建构了新的文化认同身分。

关键词:

文化身份二元性 女性文学 严哥苓 梅·蒂尔米萨尼

论文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不同形象怎么塑造了？作者能够从这些二元性中形成什么样的分类，双重文化的冲突怎么通过两位作家的作品表现出来的？在作家眼中；身份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每个人是否都拥有双重身份赖以生存？

笔者将讨论严哥苓的《扶桑》（1996）、《少女小渔》（1993）、《风筝歌》（1999）、《花儿与少年》（2011）大陆妹（2016）和《与梅·蒂尔米萨尼的《每个人都说我我爱你》（الكل يقول أحبك）（2021）之间的文化身份二元性的问题。

笔者首先将说明选择两位女作家为研究对象，其次提出两位作家的生活背景及其之间的异同点，方便认识塑造两位作家的文化身份的原因，最后把两位女作家的创作进行比较，最终得到了移民怎么对人的身份做深刻影响。

1-选择严哥苓和梅·蒂尔米萨尼创作的原因：

严哥苓是美籍华人作家，在 1958 年 11 月 16 日出生于上海她属于文艺世家；她父亲是老作家萧马，她继母是电影演员。在 1989 年严哥苓去美国留学，1990 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后，在美国结婚了王乐仁（Lawrence A. Walker）美国国务院外交官，严哥苓关注创造了很多移民女性文学创作，作家通过创作中的女性形象来表达了她个人在美国的生活、她在国外的苦难以及她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她也通过创作表现了几代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和命运，代表这些思想的严哥苓作品例如：《红罗裙》（1993）《少女小渔》（1993），《扶桑》（1996）和《第九个寡妇》（2006）。

在 2004 年严哥苓和她丈夫被派往非洲工作后，她创造了《绿血》、《小姨多鹤》、《陆犯焉识》、《海那边》、《一个女人的史诗》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梅·蒂尔米萨尼在 1965 年出生于埃及开罗，她是小说家 翻译家、学者和电影评论家，她属于电影世家；她是埃及唱片导演阿卜杜勒卡德尔·泰尔米萨尼（عبد القادر التلمساني）（1924-2003）的女儿她叔叔是电影导演卡梅尔·泰尔米萨尼（كامل التلمساني）1995 年她获

得了硕士学位，同年移民到美国；1998 年获得加拿大机构奖学金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梅·蒂尔米萨尼也关注关于移民生活、移民在国外对困难的困难、移民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来创造她文学书写；例如《阿卡贝拉》（2012年）(أكابيلا) 和《人人都说爱我》(الكل يقول أحبك) (2021年)，两部作品在本人看来反映出来埃及移民人物的形象。

从上述可以说；两位作家之间的同点就是；

1. 两位女作家属于同时代的作家。
2. 两位移民到美国留学。
3. 她们属于艺术世家。
4. 两位作家的创作显示出青春记忆、成长与她们作为移民者的经验对她们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其中严歌苓的《雌性的草地》《扶桑》、《无出路咖啡馆》、《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与《吴川是个黄女孩》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而创造的，她在羊城晚报说“我在我的文学创作常常写关于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比如我的童年、少年、我出国留学的经历和我的移民生活这些我闭上眼睛都能闻到当时的气味”¹；《阿卡贝拉》(أكابيلا) 和《人人都说爱我》(الكل يقول أحبك) 两遍小说也受到梅·蒂尔米萨尼在移民生活经验的影响。
5. 两位作家有同样的移民感情；受到移民的困难，两位在移民觉得自己文化和“他者”文化之间的冲突，然后与“他者”的文化融合了，这使她们创作中表达出来的情况，同时让她们塑造了代表她们在移民生活和经验和移民女性形象。
6. 本人看来两位作家文学创作在异乡的土地生根发芽，这样的中埃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相遇、交汇、交融而开出的一朵文学奇葩。

1 -姚春玲：“严歌苓自称很敏感的作家：或许受家族遗传的影响”，羊城晚报 2014年04月13日，16:34。

2- 严哥苓和梅·蒂尔米萨尼两位作家文化认同形成的因素:

一、两位作家的家庭:

构成任何人文化认同的最原来因素就是人的家庭，所以可以说最早塑造严哥苓和梅·蒂尔米萨尼文化认同的原因是她们家庭。上述已经解释出两位作家是属于艺术家庭，这个因素对塑造她们性格有大的作用。

对于严哥苓来说她自己强调了她爷爷和父亲怎么塑造她文化认同，她说：“爸爸的书房就是我的教室，爸爸是作家，家里书自然很多，爸爸从来没教过我如何写作，而给我的忠告是：要在喧嚣中沉下去。当时可以找到的经典作品我家基本都有，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除了藏书之外，父亲对音乐、绘画和建筑同样研究颇深，而这些也都使我耳濡目染。”¹，可以说严哥苓父亲对塑造严哥苓文化性格有大的影响，她从小看书爱好也对严歌苓的写作有深远影响，她的创作具有多元的文化背景。

梅·蒂尔米萨尼也强调了他父亲和爷爷对她文化认同塑造的影响她自己说：“我家人对广阔的人类文化很感兴趣，无论是用阿拉伯语、英语还是法语写成的，我是在这个崇尚各种艺术类型的框架中长大的，我不认识当地、埃及和阿拉伯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差异卡迈勒·蒂尔米萨尼 (Kamel Al-Tilmisani) 确实对我身分有很大的影响，他同样渴望摆脱束缚，超越国界的文化限制，并采取更全面，更广泛的文化概念，将其视为世界各地的人类文化，无论其起源和来源如何，以这种方式思考并不会造成文化中的等级制度，我属于所有这些阿拉伯和法国文化，甚至还受到东亚文化的影响..... 一般而言，我相信我属于特莱姆森家族以及我在那种环境和背景下的成长帮助我成为今天的人”²。

1 一鸿彬：“作家严歌苓：写作是种优雅的生活方式，你也可以”，重庆出版社，2021年5月3日。

2- “Mai Al-Talisman: 我从我的阿拉伯文化处发，因为我认为它向整个宇宙开放”，《Asharq Al-Awsat》报纸，2021年11月28日，12:12。

从上述可以说两位作家的文化身份早就被家庭塑造起来。

二、两位作家学习过程

两位作家学习过程也塑造了她们文化身份的多元性；对严哥苓来说她读了很多外国作家的作品，这是她第一次接触西方文化，关于梅·蒂尔米萨尼她在文学院法文系学习了，这是第一次她会接触了西方文化，特别法国文化，梅·蒂尔米萨尼自己说：“我认为我是双重文化，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当我写作时我把阿拉伯语大半个作为母语，法语当作为父亲。”¹，这就让两位作家在最早创作中很容易塑造外国人物形象。

三、两位作家移民到美国：

两位作家的社会背景和国家的传统习俗也肯定塑造了她们文化身份，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作家都移民到美国，她们两位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这对她们的文化身份有大的影响，让我们问自己这个影响是否使她们保持原来的文化、身份，或者移民国家的文化是否与她们自己的文化融合？实际上两位作家在很多记者会议承认她们是双文化性的人，她们也支持文化多元性的思想；严哥苓对记者说“华文作家应该带着自身文化的本色与异域文化不断交融、互动，通过书写展现中华文化的特色”²，那么梅·蒂尔米萨尼在一个记者会议对记者说：“我不相信东西文化的双面性的，我恨边境，我也在塑造我的人物性格时喜欢让他们具有多样文化的性格”³。

下面本人从文化身份二元性的角度来分析严哥苓的《扶桑》《少女小渔》、《大陆妹》、《风筝歌》和《花儿与少年》和梅·蒂尔米萨尼的《人人都说爱我》(الكل يقول أحبك) 中的女性人物在异国生存苦难以及与他者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1-阿曼尼·易卜拉欣：“埃及作家梅·蒂尔米萨尼：我是双文化人，我的下一部小说是关于新冠病毒的影响”的文章，“萨达·埃尔·巴拉德”，新闻网站，2021年11月17日，星期三，中午12:01。

2-杨斌：“游走东西文化之间 华文文学在海外异乡生根开花”，《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1月28日。

3-奥萨马·拉希米“梅·蒂尔米萨尼：生命需要另一种生命来书写！”《金字塔报》日报，2023年6月2日。

本人只讨论梅·蒂尔米萨尼的《人人都说爱我》，因为通过这篇小说作家巧妙反映埃及移民女性的所有种类形式，而严哥苓却在每一篇小说只反映华人移民女性的一种形式。

1- 严哥苓的《扶桑》¹:

《扶桑》作为新移民小说，小说的故事事件发生于 19 世纪的美国作家解释这个作品的思想时说“这是两种文化谁吞没谁，谁消化谁的特定环境”²，严哥苓在这个小说通过扶桑这个妓女人物、中国恶霸大勇和白人少年克里斯之间的关系发展来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扶桑是中国第一代移民的象征，她也表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一面，那么大勇代表了东方文化中的反抗象征，而克里斯代表西方文化的象征，扶桑这个人物通过这两个男人受到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

虽然扶桑是一个妓女，那么中国封建传统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概念还在她的心里，她深刻受到中国封建文化的影响，她也具有中国传统旧式妇女；她要平和地过日子，她是服从的、痴呆与温顺的。

实际上，扶桑的东方形式面貌、东方形式服饰与东方文化吸引了西方白人少年克里斯的注意和感受；有一次扶桑穿了白麻布跑（主人公开始和西方文化融合的象征），那时白人少年克里斯丧失了对扶桑得兴趣感觉，当她换上红绸衫时，就引起了克里斯的欲塑两个人物互相爱情，扶桑也开始通过这个关系成为双重文化的人物但是最终，由于她封建习俗和传统在她性格中根深蒂固，两个人物之间的爱情故事不成功的，因为东西文化之间的冲突。

虽然扶桑开始成为双重文化的人物，但是当时西方的文化比东方的文化很高，很高，这就让克里斯最终从兴趣到轻视地对待扶桑两个人物之间的冲突让扶桑决定离开他，也选择嫁给大勇（中国人），最终大勇被西方人打死了，当时扶桑把他的骨灰带回了中国。

¹-严哥苓：《扶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6。

²-李朦：“镜图微悦读| 严哥苓—主流与边缘”

https://www.sohu.com/a/315255615_99906112， 2019-05-20 17:00

上述总的来说；严哥苓通过这个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扶桑自己文化身份怎么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这就是通过她和克里斯的关系发生了，她开始成为双重文化的人；既她的语言、装饰形式已经受到异国文化的影响，但是被打死的大勇的事件让她重新寻找自我身份所以决定回国。

2- 严哥苓的《少女小渔》¹：

作者通过《少女小渔》中的主人公“小渔”反映了华人移民女性在异国社会中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苦难过程问题。“小渔”为了能获得移居国的居住证，就按男友江伟的意见同意与比她大四十多岁的意大利老人假结婚了，她在异国对面了文化的双重问题，这就是因为她在异国与有不同文化的两个不同男人（中国男友江伟与意大利老头）有关系，这就是让她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她肯定不故意地成为双重文化的女人，这当然让她遭遇了各种生存苦难，她自己的文化内部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实际上小渔是传统的妇女，她带着东方文化的特点，所以她是善良、宽厚和仁爱的妇女，她的外表柔软，但是内心强，但在西方老人的导致和教育下，她受到西方文化，意大利的老人次一次提醒小渔不要常常说“谢谢”，“对不起”之类的话句，他也教她怎么作为独立个体的、怎么尊重自己，他也让小渔从中国传统的规律解放；他教小渔不要顺从男人，也不要询问周遭人的意见，要自己思考怎么解决她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事，马里奥那个代表崇尚自由、民主、独立和平等的西方文化男人使小渔那个代表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霸权下重新寻找自我，也成功完成文化多元性的主体建构；她从丧失话语权与表达权的情况转变成为具有独立意识的西方女性形象。

笔者认为严哥苓在小说中通过融合两种文化的方式来塑造小渔以便寻找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平衡点，作者通过小说反映了东方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包容。

1 -严哥苓：《少女小渔》，1992年4，春风文艺出版社。

3- 严哥苓的《大陆妹》

这个小说通过大陆妹这个女性人物来反映从远离母语文化的人怎么越来越快失去了她们本身的语言，也渐渐受到异国的语言与文化的影响；大陆妹最早住宿在美国的亲戚家，她在吃饭时单独的使用筷子，其他家里人使用匙和餐叉，她的汉语也渐渐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她开始说“吃饭”是“此饭”，“垃圾”是“勒色”，甚至她的外面貌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头发的形式也改变从一根到披散开来。

实际上大陆妹这个人物在中西方文化交织的过程中渐渐地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因为她最早没有父母身上坚定的文化坚守。

4 - 严哥苓的《风筝歌》：

严哥苓在这个小说深刻地反映第二代中国移民的多元文化问题也揭示第二代中国移民怎么受到这个问题的困难，严哥苓通过英英这个中国青年女人物揭示了青年和父母在异国文化霸权下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这个冲突实际上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

小说叙述了英英这个女人物在移民家庭长大了，她的文化认同在异国改变了；她在父亲保守的中国文化的教导下长大了，但是异国的文化现象肯定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和谐局面；她看到了异国的新经营理论和新的思维方式，这就与父亲的守旧文化不同，最终她深刻受到西方文化，也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英英在这个小说的事件常常试一试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点，作家好像通过这个小说希望移民能在异国找到东西方文化的契合点。

5- 严哥苓的《花儿与少年》

这个小说里的女主人公也是移民女性，但是她性格和《风筝歌》中的英英性格不一样，因为《风筝歌》里的英英是第二代移民，已深刻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也放弃了中国文化的传统，那么《花儿与少年》中的仁仁；她也是第二代移民，她三岁时跟母亲一起移民到美国，她和《风筝歌》里的英英在这一点是一样的；从小就接受了来自继父的文化教育，她在表面上好像一个西方女人，但是仁仁最终

却回应继父的文化教育，她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认同时就存在了东西两种文化，在此过程中就压迫了她的东方精神内核，这让她内心处在挣杂中，所以她在这个文化冲突下趋利避害，最后她成功建构了新的文化认同，也成为二元文化的独特性格的女性，本人认为她成功地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点，从两个文化受到了最美丽的文化特点来构成新的文化身份。

本人通过这个小说看到了严哥苓已经通过仁仁这个人物来表达自己以及她作为一个中国移民在接触西方文化时所经历的困惑，又反映出了解决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的最合适方法，这就是通过选择两种文化中最美丽特征来混合两种文化，本人认为严哥苓通过这部作品为自己和所有移民找到了双中文化冲突问题的救赎。

从上述可以看到严哥苓通过上述提出的五编移民小说来反映五个性格不同的移民女性人物；《扶桑》里的扶桑、《少女小渔》里的小渔、《大陆妹》里的大陆妹、《风筝歌》的英英与《花儿与少年》的仁仁，扶桑代表第一代移民的形象，那么其他四编小说里的女性人物都代表了第二代移民的女性人物；从上述分析可以说“扶桑”这个人物因为她是第一代移民女性人物，虽然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特点，但她还不能放弃她从小深刻信仰的中国封建传统和文化，她看到了西方人怎么对待她丈夫，所以她决定离开美国也回国。

关于《大陆妹》里的大陆妹和《风筝歌》里的英英两个女性人物是第二代中国移民女性人物，她们两位渐渐放弃了自身的文化并称为西方样子的女人物，虽然两位在父母保守的中国文化教导下长大了，但是西方文化对她们性格作大的压迫影响，这让她们和父母之间常常有大的冲突，最终两个人物不能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对于《少女小渔》里的小渔和《花儿与少年》里的仁仁来说小渔和仁仁两个女人物是第二代中国移民妇女人物，她们在继父的文化教育下长大了，但是她们在这个文化冲突下趋利避害，最后成功建构了新的文化认同，也成为二元文化的独特性格的女性，她们成功地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总的来说，严哥苓通过上述的五编小说反映了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身份元性的几代华人移民女性形式；第一：是第一代移民女性人物的文化身份，严哥苓通过扶桑来揭示第一代移民怎么很难深刻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是因为她们深刻受到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文化特点，西方文化很难对这样的传统文化有什么影响，所以扶桑寻找自身身份，最终回国对于第二代移民女性人物的文化身份来说它分为两种女性形式；第一种完全放弃了自身根本的文化而深刻受到异国（美国）的文化身份特点例如英英和大陆妹，第二把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以便建构新的文化身份的女性形象例如“仁仁”。

下面讨论梅·蒂尔米萨尼的《人人都说爱我》，梅·蒂尔米萨尼通过这篇小说巧妙反映埃及移民女性的所有种类形式。

1. 梅·蒂尔米萨尼的《人人都说爱我》¹：

《人人都说爱我》讨论了当代阿拉伯叙事中的一个新话题在基于多元化、不同文化和不同身份界限消失的复杂世界中 讨论了转瞬即逝的身份这一话题。

《人人都说爱我》反映了居住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五位阿拉伯和埃及移民女性的生活和内心精神，她们都是属于社会中产阶级的中年知识分子，小说跟随她们情感生活的转折，呈现了她们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她们的选择、她们在异国遭遇困扰，她们的爱情和背叛的问题。

故事的每一章都以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的名字命名，第三四章的名字是由小说中的移民女性人物的名字努尔汉·阿卜杜勒·哈密德（نورهان عبد الحميد）与戴纳·苏莱曼（داينا سليمان）的名字，其他小说的章也反映了阿拉伯和埃及的其他女性人物的故事。

在第一章小说反映了埃及的第一代移民纳赫德（ناهده）和他丈夫卡迈勒·阿勒尔·马斯里（كمال المصرى）的故事，她过着远程婚姻生活这是因为纳赫德住在多伦多，而且丈夫住在温莎，两个夫妻感到孤独，远程婚姻生活让纳赫德的性格改变了，也成为冷漠妻子，两位夫妻在美国过了二十多年，他们常常希望回国，本人看到了纳赫德

¹ -梅·蒂尔米萨尼：《人人都说爱我》，达尔·肖鲁克出版社，2021年。

和《扶桑》里的扶桑在一些点是同样的；两位是第一代移民女性人物，她们保持祖国的文化和民族传统，两位希望回国，而无法完全和异国的文化融合，但是区别在于扶桑决定回国，她把丈夫的骨灰带回中国，但是纳赫德和她丈夫还居住在美国。

第二三章反映了努尔汉·阿卜杜勒·哈密德和她丈夫卡里姆·塔贝特 (كريم ثابت) 在异国的生活；在第二章卡里姆自己叙述了自己的故事与自己 and 努尔汉的结婚生活，从他的叙述过程中可以得到努尔汉怎么深刻想念埃及，所以她每年访问埃及。

作家在这章给读者介绍努尔汉的性格，她叙述说：“努尔汉在父母的抚养下长大，努尔汉好像是一个纯正的埃及女孩。她听乌姆·库尔苏姆 (أم كلثوم) 和阿卜杜勒哈利姆 (عبد الحليم) 的音乐，看纳吉布·里哈尼 (نجيب الريحاني) 和伊斯梅尔·亚辛 (إسماعيل يس) 的电影。她喜欢吃穆卢基耶和鸭子，她会说阿拉伯语，但不会读阿拉伯语书。她和父亲一起进行斋月仪式。她认为自己是来自加拿大的埃及人同时，她保留自己作为第二代移民的权利”¹。

第三章；以努尔汉的名字为命名，作家在这章让努尔汉自己叙述自己的故事，作家在小说使用的这个叙述方法当然为给人物大的空间以便自由表达自己的内心精神，努尔汉在第三章叙述了她从三岁至目前的故事，从这章我们发现了努尔汉从三岁去美国的故事，所以她的阿拉伯语当然受到异国文化的影响，在这章读者也可以发现努尔汉怎么受到美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这是因为她婚前，她与一名叙利亚男子发生了性关系，这与埃及人民的文化相矛盾。

努尔汉虽然深刻吸取了西方文化的特点，但是她仍然庆祝埃及的节日和活动，她自己叙述说：“在国外没有人是完全信徒的，但是每个埃及人都继续保持庆祝埃及的节日和活动。”²

努尔汉也对亚历山大说：“我对蒙特利尔的爱不如其对亚历山大的爱那么强，亚历山大的阳光把我皮肤晒成棕褐色，我眼睛也像海的蓝色一样。”¹。

¹-梅·蒂尔米萨尼：《人人都说爱我》，47页。

²-梅·蒂尔米萨尼：《人人都说爱我》，10页。

从上述可以说；虽然努尔汉最早居住美国，但她也扎根于埃及文化和传统，这是因为她受到埃及父母的文化影响，这个女性人物跟严哥苓《花儿与少年》里的仁仁好像一样的；她们是第二代移民妇女人物，她们在继父的文化教育下长大了，但是在这个文化冲突下趋利避害，最后成功建构了新的文化认同，也成为双元文化的独特性格的女性，她们成功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在第四章中，新的女性人物出现了就是戴纳·苏莱曼；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叙利亚裔女性，也是努尔汉的初恋情人巴萨姆·哈耶克（بسام حايك）的妻子。戴纳的父亲是叙利亚人，她的母亲是美国人所以她在不同文化的父母的抚养下长大了，这就让她成为二元文化身份的移民女性人物；她是一名摄影师，虽然对叙利亚革命的文章感兴趣，也对阿勒颇难民营进行新闻调查，但是她在2000年第一次去叙利亚的时候，意识到那所谓异国文化，这就因为她在美国生活很长时间

戴纳跟努尔汉的性格不一样；虽然两个人物的父母是不同文化身份的、两个在不同文化父母抚养下长大了、两个人物是二元文化身份的女性人物，但是两个在吸收异国的文化方面不一样；本人看到努尔汉比戴纳很深刻保持祖国的文化面貌，她比戴纳很想念每年去埃及，但是戴纳从来不想去访问叙利亚，只为她的工作必要去访问叙利亚，戴纳也常常喜欢西方音乐、对叙利亚菜不那么兴趣，本人可以说戴纳大概渐渐放弃了祖国的文化身份。

从上述可以说；戴纳和严哥苓的《大陆妹》里的大陆妹和《风箏歌》里的英英有一样的女性性格，这是因为她们三位是第二代移民女性人物，她们三位渐渐放弃了自身的文化；我们通过小说事件发现了这三个女性人物不说祖国的语言，只能说异国的语言，她们本来不想访问她们的国家，她们完全放弃了她们的文化身份。

在第三章，作家也给我们介绍李娜，她是此要人物，她是阿拉伯人物，实际上她不深刻地反映这个人物的生活，但是通过故事的事件，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她是已婚的妇女，而是她和纳赫德的丈夫

¹ 梅·蒂尔米萨尼：《人人都说爱我》，30页。

卡迈尔有性关系，她完全放弃了祖国的文化，也把异国的文化来代替自己国家的文化。

总的来说；距离和文化身分的二元性是小说的主题；小说涉及不同类型的疏离；疏远或内部疏远使卡迈勒和纳赫德感到尽管结婚多年，但彼此还是陌生人。

作者以人物为小说的叙述者来深入每个角色的内心精神，每个人物都接触到祖国的文化和异国文化之间所含的冲突，同时一直保持与祖国的联系方法，比如；每年访问祖国，或者听到在祖国所发生的悲惨事件或者其他政治危机。

心灵和隔阂的痛苦似乎在小说中交织在一起，通过一个共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远距离恋爱，小说中的大部分女性人物都因具有侣破裂而遭受痛苦。

小说成功地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描绘了从祖国依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女性人物，试图以一种平衡方式拥抱她们的双重身份来塑造她们文化身份深分的多元化；小说中的人物试图通过创建一个替代祖国（如卡迈勒叙述说，“在流亡中我们创建了一个平行的家庭”¹），或者通过职业发展，或者通过建立婚姻之外的关系来克服在国外遭受的损失损失例如李娜和卡迈尔的性关系。

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在试图接受自己的身份，比如戴娜，她将自己定义为来自蒙特利尔的加拿大人、来自迪尔伯恩的美国人以及出生在阿拉伯叙利亚人。

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不仅在不同地点之间移动，而且在身份鸿沟之间移动；有些人很早就移民了（纳赫德），有些女性人物属于第二代移民（努尔汉、戴纳和李娜）；有的埃及裔加拿大人、叙利亚裔美国人等等，这就使身份双重而丰富。

综上所述，塑造两位作家的文化身份的因素有相似之处，两位大部分作品重视反映关于女性的主题特别是移民女性的主题，这些作品当然受到两位自己生活经验的影响，她们的创作中的女性人物

¹梅•蒂尔米萨尼：《人人都说爱我》，15页。

也受到两位文化身份的二元性，从上面所说，本人已经清楚地解释这一事实。

结语：

笔者在本论中首先解释出严哥苓和梅·蒂尔米萨尼两位作家在成长经历、移居原因以及构成各自的文化方面有何相似之处；接下来主要讨论严哥苓的《扶桑》、《少女小渔》、《大陆妹》、《风筝歌》和《花儿与少年》与梅·蒂尔米萨尼《人人都说爱我》中的女性文化身份的二元性。

从讨论上面的文学创作能看到两位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深刻反映了她们在异国的生活经验，也反映了在异国所见面的其他移民女性形象，也深刻反映了在异国所见面的双面文化问题，通过她们作品来反映了双面文化问题的解决，就是在这个双面文化冲突下趋利避害，最后建构了新的文化认同身分，实际上解决在于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点，两位作家也使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双面文化身份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她们所有的创作都反映了移民到美国的女性的形象。

我们还能看到两位通过自己的作品体现了第一二代双种文化身份的移民女性；也发现了严哥苓通过《扶桑》中的第一代移民“扶桑”和梅·蒂尔米萨尼的《人人都说爱我》中的第一代移民女性“纳赫德”肯定第一代移民女性形象虽然她们自己的文化和异国的文化已经融合在一起，但是她们还保持祖国的文化，她们常常要回国这是因为她们的祖国文化扎根于她们的身份根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扶桑”和“纳赫德”的母语在异国没有受到影响，异国的传统习俗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习俗，可以说这两位的双重文化身份体现于说流利外语口语，也具有一些西方特征，比如冷漠地对待别人、过分矜持。

对于第二代移民女性文化身份的二元性来说；两位通过上面的创作反映了第二代移民女性的文化身份二元性的两种类；第一种类；成功地将祖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并形成具有独特文化身份的

新个性的女性形象，例如严哥苓的《花儿与少年》中的仁仁、《少女小渔》里的小渔和《人人都说爱我》中的努尔汉，她们都从最早在美国居住，她们成功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点，第二种类：放弃了祖国的文化身份，她们与西方文化完全融合，例如严哥苓的《大陆妹》中的陆妹、《风筝歌》中的英英和《人人都说爱我》中的“戴纳”和“李娜”形象。

最终可以说两位作家想通过她们的文学创作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任何人要走向世界，就不能固守某一种文化，必须以一种开放包容之心面对各种文化。

参考书

1. 艾曼·塔勒布博士：“侨民的结构和短暂者的身份--另一种存在形式--对梅·阿尔-蒂尔米萨尼小说《人人都说我爱你》的研究”，梅里特文化杂志，第 59 期 - 2023 年 11 月。
2. 程爱民、邵怡、卢俊：《20 世纪美国华裔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程国君：《全球化与新移民叙述—（美华文学）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
4. 丰云：《新移民文学----融合与疏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5. 甘立芬：《移民生存困境的不同书写—白先勇〈芝加歌之死〉与严哥苓〈少女小鱼〉之比较》，〈时代文学〉,2010 年,第 2 期。
6. 高超：《探析移民焦虑与身份重构意识—以〈少女小鱼〉为例》《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 年，第 9 期。
7. 哈撒嫩.法核米：《中埃新移民女作家叙事中的自我与身份书写—以严歌苓与米拉勒.阿勒.塔哈维小说为例》，Sahifatul-
Alsun 35 Jan 2019。

8. 湖铂，张慧敏，吴振军:《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早期华人移民形象分析—以异域环境下的创伤性事件为切如点》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6期。
9. 李佳桐:《简论严歌苓的海外移民小说》，《辽东学院学报(社会学版)》，2019年的2期。
10. 李培:《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等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华文文学，2004年。
11. 李燕:《双重视野下的文化解读，评严歌苓小说〈扶桑〉》《名作欣当》，2012年，第11期。
12. 卢华:《身份的建构:解读美国华裔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年。
13. 吕燕:“离散族袋的创作与后记忆—评严歌苓的小说〈扶桑〉”《华文文学》期刊，2012年，第1期。
14. 孟雁超:《他者身份的建构、淡化到消弭》，南昌大学2018年 硕士学位论文。
15. 梅·蒂尔米萨尼的《每个人都说我我爱你》，达尔·肖鲁克出版社2021年。
16. 穆尼尔·哈耶克:朗诵梅·蒂尔米萨尼的小说《人人都说我我爱你》，阿拉·迪亚热电子杂志，2023年4月21日。
17. 纳吉瓦·曼苏尔:“梅·阿尔蒂米萨尼的小说《人人都说我我爱你》中复调音乐和多重叙事视野的表现”，梅里特文化杂志第59期，2023年11月。
18. 倪立秋:《新移民小说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19. 饶芃子:《比较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20. 王博园:《论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身份书写》，硕士学位论文 海南师范大学，2012年。
21. 王婧:《论严歌苓小说的移民视角与身份认同》，广西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22. 王柳焯:《严歌苓移民小说女性形象文化身份困境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论文。

23. 严歌苓:《扶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24. 杨薇:《小说〈布鲁克林高地〉中的身份认同研究》，硕士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7年。

25. 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

26. 张强宏、张素娣:《异质文化语境中的身份认同与救赎—以严歌苓华人移民小说〈少女小鱼〉为例》，〈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27. 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